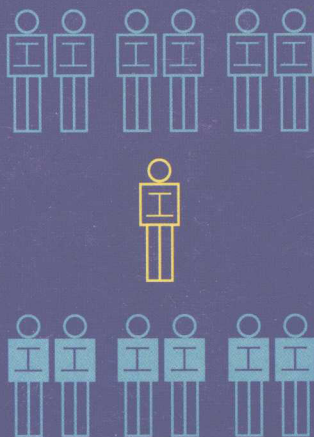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Mary Elizabeth Gallagher



政治与社会译丛


[美] 玛丽·E.加拉格尔 著
郁建兴 肖扬东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

地区投资政策的自由化，所有权类型的增多，以及在第三章中提及的越来越多的所有权重组是如何改变劳动实践的呢？对于新创办的企业，如乡镇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内私有企业来说，劳动实践从一开始就更多地受到了全球生产压力而非社会主义遗产的影响。境外投资主要来自于寻求生产更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其他东亚经济体。在其中，许多企业感受到了其他亚洲经济体工资增长和民主化的压力，因而觉得在中国生产更具有吸引力。同样，乡镇企业尽管根源于公社制度，但却在更硬的预算约束与承担国有企业 and 外资企业的转包项目的压力下经营。控制劳动成本对于这些具有劳动灵活性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在企业的这些经济压力与地区分权下以发展主义定位的地方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有利于劳务开发的环境，同时却没能强调劳动条件和工人权利。由地方政府方面提供的、旨在吸引投资和出口市场的激励措施，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都以工人们的安全、健康和权利为代价，压倒性地强调公司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Mary Elizabeth Gallagher

Copyright © 2005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 / (美)加拉格尔著;郁建兴, 肖扬东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4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2辑)
ISBN 978-7-213-04253-9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7-104号

I. ①全… II. ①加… ②郁… ③肖… III. ①劳动—生产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F24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9721号

书 名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
作 者	[美]玛丽·E.加拉格尔 著 郁建兴 肖扬东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3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253-9
定 价	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二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出版者言

出版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遽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年春

译丛第二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

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2008年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

译者序

2009年7月24日,吉林省属国企通化钢铁集团近3000名职工集会抗议知名民企建龙集团入主,竟将后者委派、刚到任的总经理陈国君围殴致死,集团子公司通化钢铁停产11小时。当晚,吉林省政府紧急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8月11日,河南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工人大规模围堵事件,约1000名情绪激动的工人围堵了企业改制工作组住宿的酒店。在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尊重广大职工意愿、暂停改制工作等六条意见后,事态逐步平息,被工人软禁约90小时的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被救出。

接连发生的通钢、林钢事件一时震惊全国,特别是通钢事件,堪称国企改革大潮中的最极端一幕。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舆情基本一边倒地倾向于通钢职工,通钢事件被贴上了“工人集体维护自己利益,抗议改制,打死资本代理人”的维权标签;而对于民企建龙集团以及遭殴致死的资方代表、职业经理人,则多加贬斥,鲜有同情。有人甚至把通钢、林钢事件看做中国劳资关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但是,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所指出,“这几起事件都是国企改革后期的一些浪花,不是很大的事”。“现在劳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方和资方的心理预期完全变了,现在是在新的法律框架以及市场化的框架下自由定价与权益保护的关系。他们那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时期的处理问题,是极少数处于困境的企业改制处理不当的问题,这不是新时代劳资关系的主趋势。国企的改制已经到晚期了,这样的企业不多了,这种处理方式也不多了。”(《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31日)

我完全认同“通钢、林钢事件不是新时代劳资关系主趋势”的说法。在我看来,通钢、林钢事件或可激活对新时代中国劳工政治的关注,倒逼我们思考国企、民企、职工之间的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以此来看,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的《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也就不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它对我们回答今天的问题提供了一份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玛丽·E.加拉格尔 200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曾于2003—2004年在华东政法大学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现任教于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是她博士论文的修订和扩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此书出版后,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极高评价,作者本人也因此跻身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新一代杰出学者行列。该书主要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劳动关系,包括公司层面的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加拉格尔的最初研究计划,是研究中国国家如何管理不同的劳动实践方式。她原先计划调研不同所有制的公司,以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劳动关系如何可能共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发现,在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不同所有制的劳动实践变得越来越类似,公私划分在决定劳动实践时并不重要。在企业中,劳动合同制度和工会组织致力于保护劳动者,使他们免受反复无常的市场的侵害,但这些制度的实施反而增强了管理自主性和对劳动的控制。法律制度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冲突的组织和调解,特别是伴随着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法》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冲突正迅速攀升,频率、规模不断扩大,难于治理性也在增加。这些趋势在外资企业中尤其明显,但也不是那里的孤立现象。

本书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比如对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已有的主要解释认为,政治稳定优先于中国改革道路的其他方面。其中一种解释认为,改革的渐进性质决定了它的成功,尤其与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相比。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有能力实施“没有输家的改革”产生了使改革得以继续的社会共识,减少了政治不稳定的威胁。加拉格尔认为,第一种解释是不充分的,而第二种解释则是错误的。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是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共同特征。俄罗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几乎都具有与中国同样长的改革历史,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中国还要长。休克疗法的实验只是在1989年政治剧变之后,当渐进、点滴的改革遭到拒绝,为了支持系统的政治

和经济改革才出现。中国的改革尽管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渐进性的,但改革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改革的顺序,对于中国取得经济改革成就更为重要。而就经济地位与政治权力这两个相关的方面而言,中国改革同样产生了输家。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在扩大中国各地区、公司和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机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国直接投资不平衡的自由化导致不同地区与公司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外资企业也不断为吸引技术工人而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这些竞争压力导致碎片化的扩大,并减少了城市劳动者对改革的抵制。而对改革抵制的减少延缓了对政治变革的要求。

再比如对于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描述。加拉格尔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但是,相应的意识形态转型并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到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发展主义。发展主义、发展型国家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策略,但它的主题却是不变的,那就是以快速经济增长的名义由国家主导发展,以及国家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领域。多年来,受加州大学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1982年)一书中提出的“发展型国家”概念影响,我试图以“发展型国家(政府)”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功,认为具有发展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地方政商合作、国家合作主义等特征的发展型国家,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郁建兴等:《超越发展型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转型》,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在当前,那种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必须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郁建兴等:《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加拉格尔从劳动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佐证上述观点。加拉格尔还指出,这种国家主导发展的观点大量借鉴了东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但与它们不同,中国大陆的发展主义建立在积极的和大量外国人参与国内经济的基础之上。

当然,《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也存在着诸多可商榷之处。最为突出的是,像很多西方学者一样,加拉格尔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术语时有着很深的思维定式,即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书中多次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实指“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

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此外,对于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等方面的诸多论述,作者也不能免于西方学者惯有的偏见。相信读者对此能够自行辨识。

本书的翻译断断续续,竟逾两年。自2007年夏天译完郑永年教授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我和肖扬东博士即开始翻译本书。直至2009年暑假,我们才终于译出全文。下半年,我又多次进行了校对。但是,译事艰难,推敲、拿捏一些句段耗费了我们很多心思,就连一些来自中文文献的引文,虽尽力查找、核对,仍有一些无法找到原文,我们只得根据英文将其译出。因此,这个译本一定存在着诸多不当甚至错译之处,万望方家能够予以指正。

写完这个译者序,已是2009年岁末。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的劳工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到来的新年或将成为新劳工政治的元年。自2004年以来“用工荒”的持续出现,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差距拉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保增长措施多依赖于投资刺激和信贷刺激,内需不足格局未有根本改变,等等,这一切都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带动需求结构调整并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已日益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思路;让劳动者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已日益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愿景。如何通过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来落实、实现这一愿景,这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

郁建兴

2009年12月31日于杭州

致 谢

如果没有下列机构在制度和财政上所提供的支持,本书将无法面世: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以及东亚研究系慷慨地资助了本书的部分研究。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商业教育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工业和劳动关系研究所,也都以不同方式促进了本计划的研究和写作。我同时还要感谢北京外交学院和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对我的多次接待,以及为支持我的研究所做出的努力。

感谢我在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时的研究生导师 Steve Goldstein,他首先激发了我对中国政治的兴趣,并以优秀的教学和学术热情鼓励我走上了学术之途。我还要诚挚感谢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Lynn White, Atul Kohli 以及 Anna Seleny,他们鼓励我,并阅读了本书的很多手稿,而且他们为人极好,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学者。我要特别感谢 Lynn White 友善的急躁,正是这种友善的急躁推动我完成学位论文以及本书的写作。除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论文答辩委员,我同时还要对其他许多学者和教师表达我的谢意,他们慷慨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和想法。他们是: Nancy Bermeo, Kathryn Stoner-Weiss, Sheri Berman, Michael Doyle, Gil Rozman, Jeff Kopstein, Gary Bass 以及 Kate McNamara。 Monica Selinger 和 Edna Lloyd 无微不至地为我提供了出色的行政支持和帮助。作为同事和朋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同学不可或缺,非常幸运我们能够彼此相遇。我尤其要感谢 Michele Penner Angrist, Dietlind Stolle, Shinju Fujihira, Kimberly Morgan, Mark Stephan, Sharon Barrios, Vanya Kriekhaus, Susan Kannel, Marc Berenson, Xiaonong Cheng, Bell Kwok, Xu Wang,

Phil Saunders, Jeannie Sowers 以及 Michael Ross。

随着本研究计划由一篇论文变成一本书,其他许多人,尤其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团队的 Brad Farnsworth, Al Feuerwerker, Whit Gray, Ching Kwan Lee, Ken Liberthal, Linda Lim, Jinyun Liu, Albert Park, Marty Powers 以及 Wang Zheng,通过倾听我的想法和阅读本书的不同章节,给我提供了帮助。还有很多人对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给予了评论,并慷慨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和想法,他们是 Eric Thun, Anita chan, Marc Blecher, Elizabeth Perry, Iain Johnston, Merle Goldman, Mark Selden, Ruth Collier, Elizabeth Remick, Dorothy Solinger, Dali Yang, Yasheng Huang, Don Herzog, Meredith Woo-Cumings, Mark Frazier, Bill Hurst, Jaeyoun Won, Kevin O'Brien, Neil Diamant, Stanley Lubman, Scot Tanner, Isabelle Thireau, Ruth Rogaski, Andy Mertha, Jerry Cohen, Noga Morag-Levine, Rob Franzese, Zheng Yongnian, Edward Gu, John Campbell, Young Jinchoi, Jacob Eyferth, Larry Root, Ian Robinson, Ken Kollman, Ashutosh Varshney 以及 Jennifer Widner。此外,在密歇根大学,我还得到了能干的研究助手的帮助和支持。我要感谢 Peng Du, Min-hua Huang, Juan Chen 以及 Lyric Chen。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 Chuck Myers,他很早就对这个计划表示出兴趣,并在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的帮助。同时我还要感谢那些匿名评论人,他们所建议的增加和变动有助于本书的最终定稿。Jennifer Nippins 和 Cindy Crumrine 在编辑和校对方面给了我重要帮助。

在中国,我要把最诚挚的感谢给予那些公司的管理者和职员,他们允许我多次采访他们,总是给我时间,优雅地对待我和我的问题。其他许多人也对这个计划提供了帮助,其中尤其要感谢 Du Jinhong, Zhang Cuiying, Zhang Jun, Pang Qiongzheng, Tu Hua, Wang Shuxin, Hu Wenbiao, Zeng Jia, Dai Jianzhong, Feng Tongqing, Ko Matsui, Muraio Tatsuo, Gao Huaxin, Jiang Junlu, Wang Jianping, Tang Jianyu, Chu Hsi-Cheng, Takeo Nishishiba, Lin Yizong, Jia Zengjun, Steve Mufson, Lei Peng, Chen Weiguo, Lu Dongxia, Liu Yingqiu, Shi Meixia, Jin Canrong, Phil Pan, Dong Baohua, Li Lingyun, Song Jing 以及 Erika Helm 等。我同时要感谢外交学院的其他外籍教师,尤其是 Grace Fan 的支持和友谊。在香港, Jean Hung 以及大学服务中心的 Robin Munro, Tim Pringle 和 Joyce Wan 为这个研究提供了帮助。

当然,在对多年来所接受的有益想法和建设性批评表示感谢的同时,我要对书中的错误和遗漏负责。

这里所提出的一些分析来自于我以前发表过的作品。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最初以“改革开放: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延滞了民主?”为题刊载于 *World Politics* 第 54 卷第 3 期(2002 年 4 月)第 338—372 页。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最初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为题刊载于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第 39 卷第 2 期(2004 年夏季号)第 11—42 页。在此,我十分感谢这些杂志社允许我引用这些作品。

与以往一样,我把最深切的谢意给予我的家人。他们作出了很多牺牲,忍受了很多沉闷的交谈。感谢我的父母 Munsey Alston 和 Steve Gallagher,他们在 1989 年别人都放弃前往中国的时候热忱地支持我远赴中国。感谢我的兄弟姐妹 Tim, Mike, Joe 和 Kate Gallagher,他们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什么是 FDI)。而对于我的女儿 Magda 和 Elinor 来说,她们认为我的全部工作就是端坐在电脑面前,感谢她们大部分时间对我的忍耐。最后,感谢我的丈夫 Ken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他经常帮助我校对和编辑,但是现在,他的时间更多地花费在去运动场和博物馆的行程中了,当然,这本该如此。

目 录

图表目录	1
译者序	1
致谢	5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传染的资本主义	11
作为竞争压力的外国直接投资	14
外国直接投资与变革的实验室	19
外国直接投资与意识形态变革	22
比较视野中的“开放”	24
结论	33
第三章 正在模糊的边界: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所有制的演变	37
本章概要	40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41
外国所有权的演变	45
“放小”: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售国有企业,1992—	55

竞争自由化及其影响	68
结论	73
第四章 不折不扣的市场:中国企业的合同工及企业代表问题	74
政策自由化与劳动力的灵活性	78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企业,1978年以前	80
局部改革阶段,1978—1992年	83
传染的资本主义,1992—	90
合同与就业风险	91
管理层对工人组织的控制或压制	97
结论	113
第五章 “以法律为武器!”外国直接投资与劳动关系立法	114
中国走向法治	117
劳工与法律的制度化	120
劳动合同制度	122
国家劳动法	128
冲突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争议	133
比较视野中的劳动争议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的发展趋势	142
劳工冲突与外国投资	151
结论	153